

温州模式的空间格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

朱介鸣 陈洁

Spatial Pattern of the Wenzhou Model: Inherent Logic Betwee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ZHU Jieming, CHEN 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of Liushi Township in Yueqing, Wenzhou,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herent logic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wnship spatial features. As a prototype of bottom-up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Wenzhou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numerous small private businesses, extensiv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alue-chain creation, and market-driven integration between sales and production. Village land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have been developing village industrial zones to accommodate home-based family businesses. After 40 years' development, Liushi has achieved spatial agglomeration where informal finance based on social trust among villagers provides critical capital to the businesses and industrial zone development. Rurality is still in place, and the bottom-up path-dependent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a highly industrialized but not urbanized town. Social capital has contributed to both inclusiv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exclusionar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nzhou needs to further open up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outsiders.

Keywords: Wenzhou model; private business; villager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l financ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social capital

提 要 以乐清市柳市镇为案例，探讨温州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温州模式是自下而上乡村工业化的典范之一，其基本要素是民营企业主导、小型企业为主、村民广泛参与创业并形成产业链和高度专业分工、市场需求推动的产品销售与制造产业链紧密结合。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利用集体土地建设村工业小区，将家庭作坊式生产提升成为园区制造。经过40年的发展，柳市镇基于村工业区的相对空间集聚成为温州模式的空间特征。非正式民间金融基于农业社会的社会信任，依赖熟人脉络或血缘关系为民营小企业和村工业区建设提供决定性的融资，包容性非农发展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农业时代的村庄社会为中心的格局依然有效，自下而上的路径依赖式发展导致工业强镇而非工业强市现象。温州模式固有的社会资本成为本土包容性和开放排他性的双刃剑。温州可持续发展需要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打造真正的城市化空间开放经济。

关键词 温州模式；民营企业；村民创业；民间金融；制造产业链；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301005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3)01-0033-06

作者简介

朱介鸣，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特聘教授，jmzhu@hotmail.com

陈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助理教授，通信作者，j_chen@tongji.edu.cn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历史上山区不通畅的道路交通阻碍了其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联系，1950年代开始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禁运和海防前线，使温州长期处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本地人口众多，耕地稀缺，农业人均产出低下，没有历史传统的制造业更处于落后的状态。1978年，温州仍然是农业经济主导，农业产出占国民经济产值的42.2%，城镇人口10.0%。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大幅度改变了温州的经济结构，2020年，农业产出只占国民经济产值的2.3%。1978—2020年期间，国民经济产值平均年增长率16.1%^[1]。温州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造就了这个非凡成就，主要特点是产业集群和高度的产业链分工。

温州地级市总共118个乡镇（2022年数据），其中18个为制造专业镇（图1）。柳市镇是18个工业强镇之一，专注低压电器生产。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柳市镇33.2万常住人口，镇域92.3 km²。工业总产值1980年是1200万元，2000年是82亿元，2019年达到660亿元。1980—2019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24.7%^[2]。辉煌的工业化造就了著名的浙江温州模式，成为与江苏苏南、广东南海、福建晋江模式并列的中国乡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上海工业用地更新空间分异研究：特征、机制及规划干预”（项目批准号：52008300）

非农发展经典^[3-6]。



注：工业强镇的确定主要根据镇域内的工业企业数量，温州小企业居多，企业数量反映温州经济的活力。

图1 温州地级市域及18个工业强镇

Fig.1 18 industrial towns in Wenzhou prefecture

费孝通于1986年提出“温州模式”这一概念并首次将其特征提炼为“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7]，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从此开始。费孝通^[7]认为温州模式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自发形成的流通网络，而熟人社会关系是此流通网络的联系纽带。史晋川^[8]、秦政强^[9]等学者指出温州模式中具有由亲缘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互惠性的交易网络特征。任晓^[10]聚焦于微观制度转型的政企互惠性利益角度，解释了温州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稳定的互惠式生产性政治关系。陈国权等^[11]提出温州熟人社会的高度信任与紧密关系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区域内的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拓展初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上述研究动向可见，相关研究未从空间结构视角探讨温州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

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城乡空间格局，新的城乡空间格局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内涵。集体土地作为村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和经济资产具有两重性，决定了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农村工业化普遍导致“村村冒火，家家冒烟”的空间现象，农民企业只能利用所在村的土地资源，造成建设用地布局空间细碎^[12-13]。昆山与南海都是农村工业化县级经济发展的典范，市场主导和政府管治的分工程度不同导致昆山与南海的空间特征不同。本

文以柳市镇为案例，深入探讨温州模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资本如何决定乡镇发展的空间特征。城乡规划的本质是空间规划，空间结构本质上由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

1 温州柳市镇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一是民营企业主导而非集体企业。早在1972年，马仁桥村11个农民各出资200元，成立柳市镇第一家民营合资电器厂。至1975年，员工规模达到125人。至1980年和1995年，电器生产企业分别达到45家和629家。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制约，乡镇企业必须是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无法正式运作（马仁桥村第一家电器厂后被政府关闭，参与农民被批判）。柳市镇上园村委会于1979年成立集体所有制“柳市胜利电器厂”，其主要功能是给村民挂户经营，办理五金电器业务合同和经费转账业务，为民营企业提供方便，带上“红帽子”，免于来自上级政府的审查和政治压力^[14]。苏南乡村发展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但是因为产权不清晰，以致在1990年代中期必须改制转型。温州模式初始即由民营企业主导，避免不必要的改制转型带来的成本。1980年代中期，改革政策正式承认民营企业合法地位，温州企业不再需要“红帽子”，柳市制造企业数量迅猛提升至2020年的12326个，其中70%从事低压电器生产^[15]。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二是小型企业为主。早期企业数量少，需要非农就业的农民相对多，1980年平均企业员工规模是80人。随着企业数量增多，1995年平均企业员工规模降低至41人^[16]，2017年更下降至14人^[17]。大量小企业说明柳市镇的企业密度高，达到每20个当地人口、每0.8 hm²一家企业。分析温州全市、18个工业强镇和柳市镇的工业数据（表1），可以推导出温州模式主要归功于产业结构中大量有活力的小企业。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三是村民广泛参与创业。从相对人口、空间的企业高密度状态，可以推算柳市镇村民高度参与创业而不仅仅是参与打工。根据上园村志记录，早在1996年，10.3%的村民就

表1 温州乡镇工业化特征（2017年）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Wenzhou's Township industrialization(2017)

范围	平均企业员工规模/个	规模以上企业占比/%	工业企业密度 (本地人口数量/ 工业企业数量)
全市118个乡镇	26	4.7	125
18个工业强镇	22	4.5	63
柳市镇	14	3.0	20

注：“规模以上企业”指年产值达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7]整理。

有自己的企业^[14]。如今大量小企业从事低压电器产业，说明了高度的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企业集聚的动力来自经济活动的规模生产和产业链。产业集聚能够形成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市场信息^[18-20]，企业集聚和合作需要地方社区内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支持^[21]。建立在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默契和社区内部的信任能够增强合作和有效的协调交易，由此降低交易成本。柳市镇村民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区，农业耕作需要的集体协作经历促使建立在乡村社会信任之上的产业链的形成。乡村社会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产业链的可持续社会成本。

温州模式的特点之四是市场需求推动的产品销售与制造产业链紧密结合。电器门市部与制造业同时并进，第一家制造企业成立于1972年，第一间低压电器门市部成立于1978年。镇区的电器产品销售在1980年达到54家，1981年达到300多家，1984年猛增至1000多家。1990年代初，上园村建立“柳市有色金属材料市场”、长虹村建立“柳市中国电器城”：前者为产业链初端，为产品生产提供原材料；后者为产业链终端，成品走向市场^[16]。中间产品从上游企业流向下游企业也是通过大量的中间产品商业市场实现（图2）。产业链中未完成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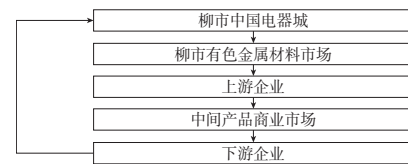


图2 连续循环的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链
Fig.2 The supply chain of electric apparatus in Liushi Township

在企业之间通过物流交接，适合于大企业签订合同的生产方式。小企业数量多、生产规模小，适合于通过第三方商业市场销售联结上下游企业。变化的市场需求及时通过销售价格信息反映到产品的生产计划中，以此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加快初始资本积累的速度。

2 温州模式的空间结构：基于村经济单元的相对空间集聚

早期的温州小企业都是家庭作坊，包括现在已经成为年产值10亿元以上、有著名品牌的大企业也出身卑微。家庭作坊不具备现代工业所必需的技术，也没有资本购置机器设备，产品质量必然低劣，所以1980年代柳市的电器产品声名狼藉。为提高产品生产质量，必须建设工业小区和购置生产设备。乡镇的土地资源主要在乡村，集体土地成为乡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在工业化推动下，1980年代初分配至农户家庭的承包耕地被重新整合成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1990年代初，8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首先利用所在村整合后的土地资源，分别成立8个村工业小区。随着全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对低压电器的需求快速上升，其他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开始开

发工业用地和厂房。工业厂房代替家庭作坊，温州模式进入新的生产方式，工业化水平提高推动了空间格局改变。柳市镇建设用地从1984年的9.1 km²增长到2020年的35.1 km²，其中工业用地占比20%（图3、图4）。工业化空间布局揭示：①以村为单位的工业用地开发，使得“家家冒烟”已经基本终结，而“村村冒火”仍在进行；②村工业用地规模与镇区中心距离成反比，形成相对集聚的空间结构；③中心镇区周边村以商业销售为主，最早从事工业生产的上园村、长虹村产业“退二进三”，显示了镇中心区商业销售主导工业发展的作用（图5）；④外来流动人口分布也呈现相对集中的空间结构，2020年来外打工人口10.4万人，其中5个中心镇区村庄容纳1.87万人（占18.0%），13个近郊村庄5.11万人（49.1%），52个远郊村庄3.42万人（32.9%）。

1984年柳市镇工业总产值是1560万元，2010年达到432亿元，1984—2010年期间平均年增长率36.8%，柳市镇成为中国低压电器生产中心^[22]。1984年柳市镇建设用地总量9.1 km²，2010年建设用地总量上升至27.3 km²，1984—2010年期间建设用地效率从1.7万元/hm²（1984年）提高至1582.4万元/hm²（2010年），

提高幅度显著。

3 非正式民间金融引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温州地区的民间金融历史悠久，传统俗称“银背”，指金融中介从民间集资再向民间贷款，贷款利息高于集资利息，中介承担贷款人破产或被欺骗的风险。大众媒体一般关注民间金融诸如高利贷、资本炒作诈骗等负面报道，实际上民间金融是温州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所有制土地被认为是“生产资料”而非“经济资产”，没有官方认可的产权证明。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发工业小区无法通过抵押土地获得银行贷款。缺乏初始资本的村民创立民营小企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抵押而得不到银行贷款。正式的金融体系不支持乡村发起的民营工业化，温州工业化发展只能依赖非正式的民间金融。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1995—2000年期间，上海的银行贷款在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在18.4%—22.4%^[23]。作为县级市的昆山，银行贷款在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是11.8%，农村地区的占比是2.1%（2010年）^[24]。温州乐清市银行贷款在乡镇的固



注：*柳市有色金属材料市场；#柳市中国电器城；1—长虹村工业区；2—后街村工业区；3—东风村工业区；4—扶贫工业区（苏岙村）；5—苏吕村工业区；6—智广村工业区；7—外向型工业区（翔金垟村）；8—西仁宕村工业区

图3 柳市乡镇建设用地分布（2020年）

Fig.3 Built-up areas in Liushi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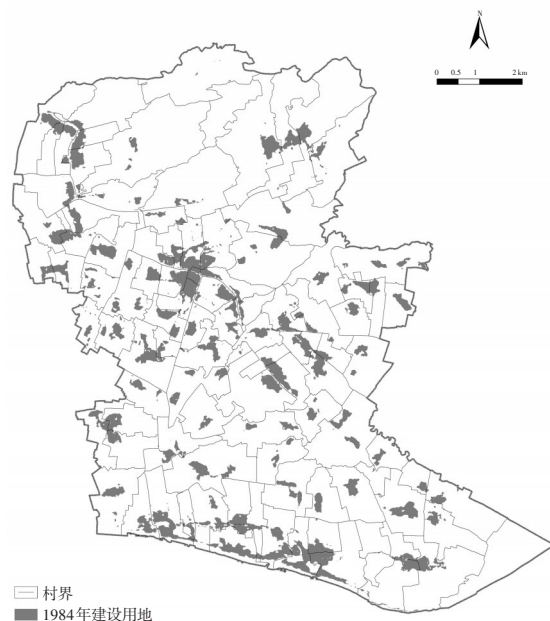


图4 柳市乡镇建设用地分布（1984年）

Fig.4 Built-up areas in Liushi (1984)

定资产投资中占比是3.2% (1989)^[25]。正式的金融机构对乡村发展的支持远少于对城市发展的支持。根据史晋川等^[26]的调查,1998年,国有部门对温州国民产值的贡献是6%,但是这些部门获取了国家金融机构80%的贷款。1993年,温州民营企业资金构成中,自筹资金占比40%,民间金融占比40%,银行贷款仅贡献20%^[26]。在1990—1998年期间,正式金融机构对温州私人企业的贷款仅占总贷款的3.9%—6.9%。1990年代温州乡镇建设的70%投资来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各级政府控制部门的投入只占10%左右^[26]。

非正式的民间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多见,特别是在具备社会信任的社区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7]。当地人之间的高度合作和信任(如北京的浙江村)使温州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社会资本的地区。根据温州市政府2004年的抽样问卷调查,温州人在馈赠礼物方面平均花费10.8%的可支配收入,在浙江省名列首位。交换礼物是增进社会互信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2011年温州人购买礼物的预算比2004年提高92%^[11]。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土地开发需要向合作社村民股东和民间金融融资,缺少资本的民营小企业主只有通过向民间金融贷款的途径创办企业。众多的小企业和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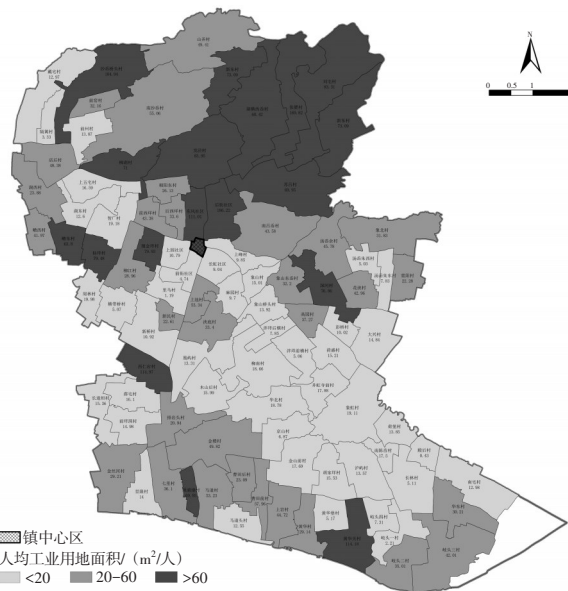
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发工业用地产生了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民间发起人组织“会”集资,大部分“会”未经注册,在熟人之间运作^[28]。根据温州一家银行在2011年的调查,大约89%的本地家庭(村民家庭居多)和60%的企业参与集资^[29]。据调查,民间金融占全国民营企业贷款总数的50%^[30]。1990年,温州民间金融融资50亿元,占银行贷款总数的80%^[31];据估计,2019年温州民间金融融资总数达2300亿元^[32]。

柳市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由非正式的民间金融支持。数以万计的民营企业 and 建设用地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相对短缺,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了贷款利率居高不下。一方面资金不足,企业无暇进行技术投入,城市建设标准低;另一方面,高利率逼迫企业提高效率,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提高厂房租金。土地稀缺和资金稀缺推动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也造成城市建成环境质量低下和企业技术创新不足,长长期可持续发展堪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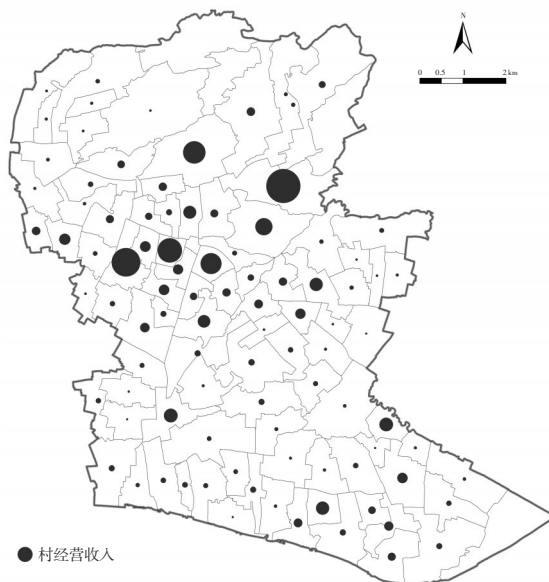
4 温州模式的包容性和排他性: 社会资本双刃剑

自治村庄土地股份合作社和民间金融支持民营小企业推动了柳市镇的工业

化,自下而上的建设用地开发下的工业化、城市化充分反映了村民和村庄集体的利益。作为集体经济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民营企业提供生产空间,集体经济发展依附民营经济壮大,村民充分创业。2021年96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平均非农土地租金收入为472.9万元^[33]。前者是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后者是体现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所代表的是包容性非农发展。上园村土地股份合作社1983年新建245间和改建220间店铺,每户村民家庭都能分到一间店铺经营商业,村委会还建造农民小区,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14]。人民公社时代村庄之间的平均主义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乡乡差别”。2021年柳市镇所有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最高经营收入是5230万元,最低是1万元,中位数是210万元,基尼系数0.61,区位因素造成的差别显著。中心镇区周围最高的8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收入总和占柳市镇总体的45.7%,最低的8个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收入总和只占总体的0.5%(图6)。农业经济时代不起显著作用的空间区位因素,在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动的乡镇非农经济中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空间差别。土地租金将成为柳市镇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土地增值归公还是



注:下方的工业用地原属象阳镇、七里桥镇、黄华镇,2012年才并入柳市镇。
图5 工业用地相对集聚的空间分布(2020年)
Fig.5 Relative agglomeration of industrial land (2020)



注:圆点尺度大小表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收入(其中绝大部分是土地租金收入),最高经营收入是5230万元(最大圆点),最低是1万元(最小圆点)。
图6 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租金收入
Fig.6 Land rent revenue of village land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归村？城市化的空间公平是未来需要关注的要点^[34-37]。

土地是村庄集体所有，土地收入支持的集体经济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包容性非农发展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38-41]。镇域内的空间差别只体现在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收入差别上，温州独立存在的工业强镇现象也反映出县域内、市域内的发展空间差别，原因可能在于民间金融运作所依赖的熟人脉络或血缘关系。因为缺少资产抵押，依靠信任抵押的非正式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借贷关系只限于熟人圈，而熟人脉络的空间分布距离有限，以农业时代的村庄社会为中心的格局依然有效。自下而上的路径依赖式发展导致工业强镇现象，而非工业强县、强市现象（图1）。

柳市镇域内基于村庄利益的空间格局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高土地租金收入的村庄福利只限于本村村民，而非在镇域内共享，对外来移民的排他性更为显现。因为耕地稀缺，上园村1950年人均耕地0.9亩（600 m²），1980年因为人口增加而人均耕地降低至0.3亩（200 m²）^[44]。村庄仅能接纳村民新生代和嫁入媳妇，所以村庄比城市更排外，外来移民还有机会申请城市户口，移民基本没有机会申请村民户口。柳市镇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2010—2020年期间，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是很少有外来移民申请本地户口落户，户籍人口10年间仅从21.4万人上升至22.8万人^[2]。10年间，乐清市和柳市镇的户籍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6%。作为比较，同为县级市的昆山，2010—2020年期间的户籍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4.1%^[42]。杭州同时期的户籍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7%^[43]。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固然显示了对本地村民的包容性，村民直接得益于非农发展，但体现本土村庄和村民利益的城市化空间，同时也呈现出对外来人的排他性。温州模式的包容性和排他性体现了社会资本双刃剑特性，发展的路径依赖规律使得乡村的排他性进入应该具备开放性的工业化非农空间。

社会资本双刃剑使得柳市镇早期的快速发展进入瓶颈状态，长期可持续发展遇到挑战。工业总产值2011年610亿

元，2020年687亿元，在低值560亿元（2012年）与高值687亿元（2020年）之间徘徊，2010年代平均年增长率仅1.3%^[2]。城市化空间宏观结构体现了制造—销售相互推动生产方式的空间集聚逻辑，而城市化空间微观结构反映了村庄利益分割城市整体格局而呈现空间细碎化的结果。城市化空间的排外性阻碍温州继续发展，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是温州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所在。

5 结语

改革开放使得温州一跃成为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典范，农业乡镇变成工业强镇的发展造就了非凡的温州模式，自下而上乡村工业化的特点是产业集群和高度产业链分工。

温州柳市镇形成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其生产方式具备四个特点。其一是民营企业主导，而非集体企业；其二是小型企业为主，2017年平均企业员工规模14人，规上企业占比3.0%，低于全市平均值4.7%；其三是柳市镇村民高度参与创业，大量小企业从事同一产业说明高度的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产业集聚形成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市场信息，建立在乡村社会信任之上的产业链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其四是市场需求推动的产品销售与制造产业链紧密结合，小企业数量多、生产规模小，适合于通过第三方商业市场销售联结上下游企业。

产品的市场竞争促使柳市镇从早期简陋的家庭作坊生产逐渐转移到工业小区，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主导工业小区开发，集体土地成为乡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转型后的生产方式引起基于村经济单元的建设用地空间向中心镇区的相对集聚，以村为单位的工业用地开发基本终结了“家家冒烟”，而“村村冒火”仍在进行。中心镇区周边村经济转型，从制造转向工业原料、中间产品及最终成品的销售。柳市镇经过30年（1980—2010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低压电器生产中心。

民营小企业和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无法得到正式金融机构的支持，民间非正式金融成为温州

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风险借贷成本高昂，资金稀缺推动了经济发展效率，也造成城市建成环境质量低下和企业技术创新不足。使广大村民受益的乡村非农发展模式和民间金融显示出温州模式的本土包容性，但是乡村社会特有的排他性使得温州特有的社会资本成为双刃剑。温州模式的继续辉煌需要真正的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支持。

基于本土社会资本的非正式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在英语学术文献语境中称为informality，众多研究经久不衰，认为在市场和政府忽视社会低收入群体福祉的情况下，自发的非正式经济和空间建设无疑是正面的发展模式。但是，非正式城市化发展一直是利弊共存，学界、业界、政界因立场不同而评价不同。自下而上乡村工业化的早期利大于弊，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打破计划经济制度的僵化控制，为千年贫困的中国乡村指出一条致富道路。然而在后期呈现出不可持续的趋势，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效率低下，“乡乡差别”造成乡村社会非农发展的初始不公平^[44-47]。各界的共识是自发建设的城市化空间模式需要提升，亟待打造真正开放、包容多元、吸引人才、鼓励竞争的城市空间。

但是已经形成的空间利益结构对于空间特征更新构成重大的挑战，产权结构下的“食利阶层”（rentier class）所塑造的空间结构因为“路径依赖”而被“锁定”，空间更新成本巨大。打破现有空间格局的城市化提升需要更大的推力，而推力需要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48-49]。尽管中国还是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防止发达国家老工业城市（如英国的格拉斯哥、美国的底特律等）因为产业衰退，产业空间无法及时更新而落入陷阱、被遗弃的命运。柳市镇的知名企业，如德力西集团，可以通过向外投资甚至全球化海外投资发展，获得所需要的企业开放型人才。与柳市镇经济产业提升相匹配的城市空间更新，只能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长期持续渐进式进行。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空间结构转型经验，1991年新加坡战略规划定位为东南亚中心城市，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促成2001年战略规划的世界级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努力在现状土地产权框架下打

破原有城市空间格局，以期更新后的城市空间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世界各地人才。重要之处是基于空间规划实施的空间管治手法^[50]。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颖、开欣女士，浙江华地电子有限公司陈鸿先生协助现场调查收集数据，陈莉、黄侨协助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济大学朱牧文、沈凌雁、孙烨、刘洋提供研究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温州统计局. 温州统计年鉴, 202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2] 乐清统计局. 乐清统计年鉴, 202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3] 张月友, 凌永辉, 徐从才. 苏南模式演进、所有制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高度化[J]. 经济学动态, 2016(6): 13-25.

[4] 赵毅, 张飞, 李瑞勤. 快速城镇化地区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以江苏苏南地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2): 98-105.

[5] 毛艳华. 珠江三角洲“南海模式”: 中小企业发展特征与启示[J]. 南方经济, 2003(4): 44-46.

[6] 刘新伟. “晋江模式”内涵新解[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4): 116-117.

[7] 费孝通. 小商品大市场[J]. 浙江学刊, 1986(3): 4-13.

[8] 史晋川. 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 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 浙江社会科学, 2004(2): 16-20.

[9] 秦政强. 互惠交易与温州模式的锁定[J]. 现代经济探讨, 2010(4): 23-26.

[10] 任晓. 制度转型的互惠性动力: 经济民营化变革中的地方政府意志: 关于“温州模式”生成的一个假说及其检验[J]. 社会科学研究, 2006(1): 68-74.

[11] 陈国权, 曹伟. 人情悖论: 人情社会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1): 15-19.

[12] 孙莹, 张尚武. 城乡关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变迁与发展[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1): 89-95.

[13] 李雯琪, 张立, 张尚武. 中国城乡融合研究的议题、评述及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6): 36-43.

[14] 胡省三. 上园村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5]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 202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16] 汤一均, 郑梦熊. 柳市镇志[M]. 合肥: 黄山

书社, 1998.

[17]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 2017[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18]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25.

[19] PORTER M E. On competition[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20] PERRY M. Business cluster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 Routledge, 2005.

[21] GORDON I R, MCCANN P. Industrial clusters: complexes, agglomeration and/or social networks? [J]. Urban Studies, 2000, 37(3): 513-538.

[22] 乐清统计局. 乐清统计年鉴, 201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23] 上海统计局. 上海统计年鉴, 200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24] 昆山统计局. 昆山统计年鉴, 201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25] 乐清统计局. 乐清统计年鉴, 1990[M]. 乐清: 乐清印刷厂, 1990.

[26] 史晋川, 叶敏.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 温州案例[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1): 63-68.

[27] DEKLE R, HAMADA K. On the development of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in Japan[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0, 49(1): 77-90.

[28] TSAI K S. The persistence of informal finance[M] // FRIEDMAN E, GILLEY B. 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9] 刘书超.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探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2, 171: 62-63.

[30] 安起雷. 对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与建议[J]. 宏观经济管理, 2012(1): 40-43.

[31] 李超伟, 杜鑫. 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现状分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12(2): 29-31.

[32] 陆田, 雷伟悦. 民间金融风险的因素分析: 基于温州指数[J]. 新经济, 2022(1): 98-104.

[33] 乐清统计局. 乐清统计年鉴, 202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34] 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M].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ryer, 1878.

[35] STIGLITZ J. The theory of local public goods[M] // FELDSTEIN M. S, INMAN R. P.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services. London: McMillan, 1977.

[36] HAGMAN D G, MISCZYNSKI D J.

Windfalls for wipeouts: land value capture and compensation[M]. Chicago: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ing Officials, 1978.

[37] HEALEY P, PURDUE M, ENNIS F. Negotiating development: rationales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ment obligations and planning gain[M]. London: E & FN Spon, 1995.

[38] SKINNER G W.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71, 13(3): 270-281.

[39] DUARA P.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0] WONG C P W. Rural public finance[M] // WONG C P W.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 TSAI L L.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 101(2): 355-372.

[42] 昆山统计局. 昆山统计年鉴, 202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43] 杭州统计局. 杭州统计年鉴, 202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44] 朱介鸣, 裴新生, 朱钊, 等. 城市化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规划: 乡村非农发展与农业发展的互动关系[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3): 24-32.

[45] 陈小卉, 间海.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下乡村空间规划探索: 以江苏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1): 74-81.

[46] 朱介鸣, 郭旭, 郭炎. 国土空间规划重构紧凑城市: 乡乡差别与空间公平[J]. 城市规划, 2022(6): 48-56.

[47] 朱继任, 朱介鸣. 社会公正理念前置的国土空间规划建构: 理论思考与治理路径[J]. 规划师, 2022, 38(10): 5-11.

[48] 钱慧, 张博, 朱介鸣. 基于乡村兼业与多功能化的城乡统筹路径研究: 以舟山市定海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S1): 82-88.

[49] 李和平, 贺彦卿, 付鹏, 等.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动力机制与空间响应模式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1): 36-43.

[50] 朱介鸣. 基于市场机制的规划实施: 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对中国城市存量规划的启示[J]. 城市规划, 2017(4): 98-101.

修回: 2023-01